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數年

邇者詔

大小學

是風氣

國以為

空言無

不練之

戊戌變法與

翁同龢

中央文獻出版社

戊戌变法与翁同龢

常熟市人民政府 编
中国史学会

主 编：金冲及
戈炳根

副主编：蔡 焜
朱育礼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9

ISBN 7-5073-0882-0

I. 戊… II. ①常… ②中… III. ①戊戌变法-研究-学术会议-文集②翁同龢-人物研究-学术会议-文集

N. K25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7198 号

编 者/常熟市人民政府
中国史学会编

责任编辑/张文和

封面设计/朱育礼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立信会计常熟市印刷联营厂

印 刷/立信会计常熟市印刷联营厂

装 订/立信会计常熟市印刷联营厂

850×1168mm 32 开 11.25 印张 280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册

ISBN 7-5073-0882-0/K · 413 定价: 30.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以史為鑑

江道涵

五九年
青
廿七日

序

金冲及

这几年来，常熟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史学会先后召开了“甲午战争与翁同龢”、“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两次学术研讨会。它显示了翁同龢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又表明史学界对翁同龢和有关历史事件的研究正在不断走向深入。

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都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那是一个大动荡的年代。在这以前，中国虽然遭受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严重失败，对外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许多人仍认为这只是在“船坚炮利”等方面不如那些西方大国，而对中国原有的社会制度和传统观念很少有什么怀疑。标榜“自强”和“求富”的洋务运动，更给不少人带来一种虚幻的安全感。甲午战争的失败，把这一切骤然结束了。这一年，严复写下了四篇产生巨大影响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劈头就写道：“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救亡决论》中更喊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只要是怀着强烈爱国心的中国人，都痛苦地感到：再按照老的路子走下去是不行了，中国必须有一个大的变革。戊戌变法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过值得自己骄傲的辉煌过去，要突破旧传统的束缚，走上一条新的路子，又谈何容易。人们的思想要从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已经习以为常的定式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客观环境猛烈变动的震荡，不经过一

个艰难的摸索过程，是很难实现的。

在翁同龢身上，我们正可以看到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时，新旧两种思潮在那些传统知识分子头脑里发生的剧烈冲突和复杂变化。大家都知道，翁同龢出身名门，自幼饱读经史，受过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状元及第后两任帝师，又作为朝廷重臣长期参与中枢决策，在晚清政局中是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人物。处在这样地位的人，当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时，经过深思熟虑，置个人荣辱安危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奋起呼号，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在戊戌维新时力主变法，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也因为他处在这样的地位而能这样做，就起了其他人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从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自己深深的印记。他的贡献是不应该被后人忘记的。

“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学术研讨会，有许多国内著名历史学家和对翁同龢素有研究的学者参加，以宽阔的视野考察了那个时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动，又细致地剖析了翁同龢在这场大变动中的态度和作用，旁及其他有关问题。探讨中，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各抒己见，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注意到其中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包括翁同龢身上那些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这种探讨不仅推动对翁同龢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更加深入，而且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对上个世纪之交那个动荡岁月中的中国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现在，把这次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编印出版，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目 录

序	金冲及(1)
千秋功过论戊戌	戴 逸(1)
戊戌维新百年祭	张 磊(8)
维新与启蒙	汤志钧(11)
戊戌变法的思想解放意义	胡绳武(19)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戊戌维新	罗澍伟(27)
戊戌政变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茅家琦(37)
甲午战后至百日维新清政府的改革措施	迟云飞(46)
戊戌变法与晚清漕运变革	戴鞍钢(57)
翁同龢的精神遗产与常熟地方文化	徐国强(68)
翁同龢政治思想研究	翁 洁(74)
改革贵先行 变法宜稳健	
——谈戊戌变法与翁同龢	谢本书(93)
翁同龢维新变法思想简论	谢俊美(99)
翁同龢的维新思想之形成初探	仲伟行(112)
有家归未得——《松禅老人生平》之二	翁开庆(117)
戊戌变法运动中的翁同龢与光绪帝	章伯锋(129)
乙未至戊戌年间的翁同龢与李鸿章	翁 飞(138)
翁张交谊与维新运动	苑书义(179)
戊戌变法时期的翁同龢与张謇	
——《张謇日记(戊戌年)笺注》节录	祁龙威(186)

2 戊戌变法与翁同龢

翁同龢“朋谋纳贿”辩诬	戚其章(206)
小议翁同龢的人才观对翁、康关系的影响	俞 政(216)
“翁同龢荐康”说考辨	
——翁、康关系再认识	马忠文(224)
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	戴 逸(254)
翁同龢与晚清宫廷教育	刘 明(269)
翁同龢经世致用教育思想研究	胡燮敏(277)
关于翁同龢一封密函的订正	孔祥吉(288)
翁康关系史料辨伪	朱育礼(294)
《翁同龢文献丛编》编印缘起	翁万戈(304)
价值连城的历史文献	
——写在《翁同龢文献丛编》出版之前	孔祥吉(310)
翁同龢文物收藏述略	蒋伟国(327)
附录:	
在“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欢迎词	
.....	戈炳根(335)
在“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欢迎词	
.....	李文海(338)
在“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	王汝丰(342)
在“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闭幕词	
.....	胡正明(347)
“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 磊(349)

千秋功过论戊戌

戴逸

一百年前的戊戌年(1898年),北京发生了一场旨在图强御侮的变法运动,史称“戊戌变法”。

自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巨款、割台湾、开商埠、夺利权。从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为加紧,各自割据势力范围,抢夺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企图瓜分中国。中国有志之士,目睹国家艰危,无不义愤填膺,奔走呼号,探索自救之道。1895年康有为等赴北京应试的全国举人,上书清廷,反对《马关条约》,要求搬迁国都,实行变法,继续抵抗日本,是为“公车上书”,开变法运动之先河。继之,维新派以变法救亡为号召,在各地建学堂、开报馆、设学会、译书籍,举办各种实业,以求中国之进步。维新变法思潮,汹涌激盈,不可抑制。一部分上层统治者,包括光绪皇帝和翁同龢在外患日棘的刺激下,也倾向于变法,起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定国是,申明变法的决心,并斥责守旧大臣:

“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喁咷咷,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撻坚甲利兵乎?”

(四月二十三日上谕)

自此日起,光绪帝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屡颁谕旨,行使新政。至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新政大约有：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废八股而改试策论；诏举经济特科；命官员保举新政人才；设商务局、农工商局以振兴实业；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催办京汉铁路及粤汉、沪宁铁路；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设立大中小学堂，命选派学生赴外国游学；设译书局以翻译西书；用新法练陆军、习洋操；裁撤衙门以减省冗员；各部删订则例，以求办事简便有实效，鼓励士民上书言事等等。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反对变法，9月21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囚禁光绪，夺取权力，康梁逃亡，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捕遇害。一大批支持变法的官吏知识分子，或罢官、或流放、或拘禁，戊戌变法，如昙花一现，归于失败。

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一个世纪，百年沧桑，神州巨变。戊戌以后十三年，即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埋葬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君主制度。戊戌以后半个世纪，民主革命获得胜利。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被推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戊戌以后一百年，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正意气风发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抚今追昔，感奋实深。回顾百年前的戊戌变法，它的历史贡献在哪里？它的局限性又在哪里？

戊戌变法的主要贡献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动摇和局部改变了传统的封建制度，人们尝试着要建立一个独立、繁荣、富强的近代中国。

中国本来是个封建国家，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政治上是绝对的封建专制君主统治，文化教育上崇尚儒家的纲常伦理，实行科举八股的教育考试制度。这样的国家和英法等正在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完全不同，已大大落后于英法。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外国侵略，屡战屡败。事实证明：传统的封建制度在近代世界中已不能生存下去。洋务派已

认识到外国的先进性，他们用西法制炮造船，开工厂、筑铁路，但洋务派不想根本改变旧制度，他们只在器物的层面上，学习西方的长处，以补苴中国的旧制度，无意把中国变成一个不同于封建制度的近代国家，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际含意。戊戌维新派的先进之处，在于认识到器物层面的某些改变不可能挽救中国，必须从根本制度上进行改革，把传统的封建专制的农业国，改变为近代君主立宪的工业国，才能拯救中国的危亡。所以他们主张要“大变”、“速变”、“全变”，大大突破了洋务派认可的变革范围。因此，维新派的主张不仅为守旧派所反对，也为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所不容。守旧派与洋务派勾结起来，共同扼杀了戊戌变法。

第一，戊戌变法的贡献在于：政治上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君主制度，建立近代的君主立宪国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君临万民，独揽一切，权力不容分割，不受制约，排斥了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的权利，是造成不公平、不平等以及暴政、动乱、腐败的根源。戊戌时代的维新派强烈要求改变专制制度，他们借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思想。谭嗣同就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先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仁学》）。原来巍巍在上、发号施令的“天子”不过是老百姓“共举”出来办事的，办不好事，还可以“共废之”。这样一来，几千年相传的专制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被戳穿了，这在当时是十分大胆而新颖的见解，而且他们尽情揭露了君主制度下的悲惨现实，直斥清朝的统治“如此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仁学》）。有的维新派指出：专制制度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因为，在专制统治下，君与民、官与民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人民“屏息潜伏不敢轻议国事，以触文法……其

民之气既散，益块然干槁，安于醉生梦死”，“外患猝至，乃如摧枯拉朽，莫能御矣”（欧榭甲：《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按照维新派的说法：只有召开“议会”，实行“立宪”，使专制君主的权力有所制约，才能“解生民于倒悬之危，置国家于磐石之安”。

尽管君主立宪的主张客观上只能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开辟道路，并不能真正挽救中国，但维新派力争制约君主权力，摆脱专制主义的束缚，这是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只有人们不再相信君权的神圣，从专制皇权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继续前进，走上推翻皇帝的革命道路。所以，戊戌时代这一思想解放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进一步革命化创造了条件。

第二，戊戌变法的贡献还在于经济上倡导民营企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洋务运动中，中国已出现了工厂、矿山、铁路等近代企业，但数量较少，而且大多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都要挂上“官”的招牌，民营企业则得不到保护。1890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因基隆煤矿亏损累累，上奏清廷，请求将煤矿改为商办，清廷不准。守旧大臣驳斥道“民有权，则官无权矣”，刘铭传被交部议处。

戊戌期间光绪帝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百日维新的第一天，即下谕各省设立商务局。据御史王鹏运的意见，“请于各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各商公举殷实稳健，素有声望之绅商，派充局董，驻局办事”，“毋庸设大臣督办”；以后两次谕令刘坤一、张之洞在上海、汉口试办商务局，创立商会，这是提倡摆脱了官方约束的民间组织和企业；又鼓励士民著作新书，创行新法，制造新器，准许专利；甚至民间可以“兴造枪炮各厂”，“著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激劝”（五月十七日上谕）。连枪炮厂都许民间设立，其它民营企业更不在话下。又奖励商人张振勋、吴懋鼎开办的烟台酿酒厂和天津呢绒厂，命地方官“体察商情，尽力保护”（五月二十六日上谕）。后来又在北京设立农工商局，命各省设分局“分别制造，以扩利权，而资民

用”。这一系列保护和鼓励民间工商业的谕旨，虽由于守旧派的阻挠拖延大多未能实现，但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已不可动摇，对于私人创办工商业起了重大的鼓舞作用。故戊戌变法以后，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多达80%以上。而戊戌前后三年中(1897—1899年)中国创办的厂矿54个，资本额621万元，其中商办占70%，民间企业已成工商业的主流。

第三，戊戌变法的贡献还在于百日维新期间废止了八股文，改革了科举制，提倡学习西方，实行近代的教育制度，采取近代的文化设施，如开学堂、设报馆、立学会等等。维新派非常重视人才的教育。康有为说：“欲任天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急于教育”(梁启超《康有为传》)。梁启超说：“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科举制和八股文是禁锢心智，脱离现实的典型。知识分子只去读古代的儒家经典，按固定的格式写文章，就可得到高官厚禄。维新派对此作了猛烈抨击。严复说：“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蓄”。在变法期间，类似这种抨击科举八股尖锐言论，俯拾皆是。

维新派在反对科举八股的同时，又提出讲求西学，学以致用用的主张。他们在教育文化方面，一是主张开办新式学堂，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特别提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并令各地筹设大中小学堂和各类专业学堂。二是科举不用八股文，改试策论。“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效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六月初一日上谕)，并开设经济特科。三是鼓励创办报纸，谕改《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各报体例，自应以牖陈利弊，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六月初八日谕)。此外还鼓励译书，选派出国留学，

许士民上书言事，开放舆论。在朝廷的大力倡导下，社会风气日新，学堂、报馆、学会纷纷创立，如雨后春笋，一发而不可阻遏。戊戌变法后七年，延续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取士终于被废止，近代教育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封建教育，报刊等大众媒介也日益普及。

总之，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动摇或部分改变了封建制度的某些方面，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当然，维新派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们在变法运动中表现得幼稚、脆弱、动摇、冲动、盲目乐观，反映了软弱性、妥协性和不成熟，缺乏远大的规划，切实的行动，纸上谈兵，并无实际。许多应该做和必须做的事，他们想不到去做，或者不可能做，不愿意做。维新派当时的种种失误、缺点和短见，需要用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求得理解，而不可苛求于前人。

戊戌变法时期，新旧力量的对比很悬殊，守旧势力尚很强大，天下滔滔，皆入于此。而新兴资产阶级刚刚从旧社会的母腹中孕育诞生，非常稚嫩，不足以冲破旧势力的障壁。当年的维新志士们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或为举人、秀才，或为中下级官吏，没有地位、权力与声望，有感于国家的危急，人民的贫穷，他们怀抱救国安民的理想，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那时候还不可能走向民间去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因而得不到社会支援。那时也没有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方针，以指导变革主体。联系松散，意见分歧，力量薄弱。他们寄希望于光绪皇帝，以为只要说服皇帝本人，同意实行新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可以冲破一切阻力。他们低估了盘根错节的守旧势力。而守旧派，上有慈禧太后高高在上，专横揽权，下有枢廷诸臣、封疆大吏顽固不化，墨守成规。光绪帝百日维新所下的新政诏谕，他们不执行，不办理，推诿拖延，束之高阁。对维新派人士则嫉恨怨妬，公开攻讦，势如水火。守旧派大权在握，不可动摇。故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束手就擒，六君子坐待诛戮。变法维新的大厦，突然倾倒，土崩瓦解。

戊戌变法是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早期尝试。中国的近代化是长期、艰难、曲折、复杂的过程，会碰到许多艰难险域，遭遇种种挫折失败，越过无数急流险滩。需要有正确的、符合国情的指导理论，有克服众多困难的战略策略，有团结坚强、为之冲锋陷阵的改革群体、有支持改革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基础。这一切，维新派均付缺如，它是一场准备很不充分的政治运动。当年的维新派承担了一项自己难以胜任的任务。就像康广仁批评他的哥哥康有为所说：“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街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戊戌六君子遗集》第6册）。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悲剧有其深刻的根源，是历史的必然。

一百年来，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今天的中国已是独立而初步强大的国家，已经实现了戊戌时代维新志士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代化的道路仍很漫长，缅怀前贤，意气奋发。我们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全面繁荣而努力奋斗。

戊戌维新百年祭

张 磊

时光流驶，一个世纪似乎瞬息即逝。

戊戌变法，临到了它的百年祭。

以“六君子”血洒京师和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异域为终局，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无疑是一出内涵丰富深刻的悲剧。因之，缅怀先驱者的业绩，总结这桩历史事件带有的不同层次的经验与教训，恰如其分地评价其地位和作用，就是十分必要的，并且应当不断深化和拓展。尽管百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关于维新运动的研究仍然兼具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和瞻望未来。

近代中国，乃是维新运动的历史舞台。严峻的现实是：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为发端，中国社会从中世纪末期入于近代，近代化的课题由是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近代和近代化的实际社会内涵，在中国却是异于西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代替了资本主义化。所谓“后发外生型”或“外发次生型”的近代化模式，无非意味着新阶段的帷幕开启既非生产力的巨变所导致，亦非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所引发，而是为了一场肮脏的英国侵华战争所拉动。双重挑战形成的强烈的外烁作用深切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进程，阻断了它的循序渐进的正常发展道路，使之沿着一条充满窒碍、牺牲和顿挫的途径滑向悲惨的深渊，沦为一种畸变的过渡社会形态。

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总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

一个世界”。“自己的面貌”的内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明显差异。“为自己”的欲望，则是一以贯之。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阳光下的地盘”业已分割殆尽，从殖民地附属国掠夺超额利润越发成为宗主国生存的必需条件，就只能“创造”出“为自己”服务的“伙计”——使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变革内容与程度局囿于有限的、附庸的层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确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

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加速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经济的解体，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发，但却又以“残酷的统治”截断了中国近代化的健康发展，使之在半殖民地化的同时依然保存了封建主义。西方的“文明使者”竭力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卫护许多中世纪的朽败事物，甚至与反动统治者结成联盟，以阻碍任何真正的社会变革，维持现存社会秩序。国内统治者则往往藉卖身投靠侵略者以图存，晚清政府实际上已经蜕变为“洋人的朝廷”。民国时期的形形色色的统治者，亦莫非列强的鹰犬。没有真正的独立，缺乏起码的民主，加之贫困与落后——这就是旧中国的基本国情。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民并未在失掉“旧世界”的同时获得一个“新世界”。无可置辩的事实是：“新的社会因素”只有在彻底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枷锁后才能结成“果实”。

因此，近代中国的任何变革方案都必须植根于这种现实的土壤。中国的近代化，无疑有着鲜明的特色：打破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双重枷锁为前提，民主政治为杠杆，工业化为重心，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为条件。为了拯救和发展中国，上述课题是不可或缺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为其高峰——的重大历史地位和作用，正是在它对近代化的主要课题的回答中凸现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戊戌变法堪称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正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维新思潮汹涌澎湃并